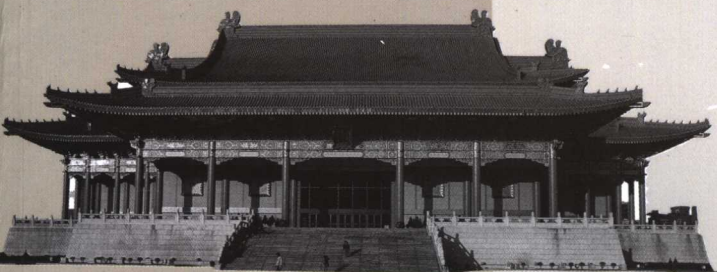


文化 与 东亚、西欧

■ 陈剑峰 著

国际秩序



■ WENHUA YU
DONGYA XIOU GUOJI ZHIXU

上海大学出版社



文化与东亚、西欧国际秩序

陈剑峰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东亚、西欧国际秩序 / 陈剑峰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 3

ISBN 7-81058-635-1

I. 文... II. 陈... III. ①国际政治关系—研究—东亚②国际政治关系—研究—西欧 IV. ①D831.02
②D856.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333 号

文化与东亚、西欧国际秩序

陈剑峰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36)

(e-mail: sdcbscitiz.net 发行热线 66136010)

出版人: 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照排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75 字数 250 000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100

ISBN 7-81058-635-1/C. 033 定价: 15.00 元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文化与国际秩序	9
第一节 文化的作用	9
第二节 什么是文化	16
第三节 东亚与西欧国际秩序概说	21
第二章 东亚、西欧国际秩序的生成与发展	27
第一节 东亚国际秩序的生成与发展	27
第二节 西欧国际秩序的生成与发展	56
第三章 东亚西欧国际秩序的渊源及其发展的变异	101
第一节 东亚同心圆秩序：西周五服图式的延展	101
第二节 西欧国际秩序：古希腊城邦秩序的子代	107
第三节 春秋战国：同心圆秩序的变异	117
第四节 罗马帝国：多国分立秩序的变异	126
第四章 东亚与西欧国际秩序分异的基础	140
第一节 分异的自然基础	140
第二节 分异的人文基础	167
第五章 全球化与东亚	187
第一节 文化的全球互动	187
第二节 “基因转变”与东亚崛起	192
第六章 地球村与世界文化	225
第一节 文明：离兮合兮？	227
第二节 即将到来的地球村	235

第三节 世界主义：东方与西方	240
第四节 世界文化与全球共治下的秩序	244
参考文献	254
后记	268

导 言

本书旨在从文化角度剖析东亚与西欧国际秩序差异的根源,并以文化为主线解析东亚、西欧国际秩序生成、发展、充实和衰退过程及其分途的原因。

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总体上是汤因比的人类文明史的比较研究,同时各章节里又采用华尔兹的国际政治三层面分析方法及理论。

一

东、西方人所创造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其中原因很多,且错综复杂,但若追本溯源,造成差异的原初因素恐怕与中、西方初民的生活环境以及其在各自特殊环境中所创造的文化有关。因为一个民族实质上就是一个文化体系,国际关系就是文化体系间互动的关系。中、西社会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交替领先,其缘由大多与不同的文化特性有关,并非能用简单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解说得清楚。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而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不仅是物质财富创造的过程,更是文化创造的过程。生产力的发展又是人类意识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自然的过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可归结为人,人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在改造自然以谋求生存的过程中,由于自然环境、气候等因素的不同,生发出不同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人生态度又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格与文化精神,即民族文化。当一个民族的文化网基本形成后,它就像该民族的“基因”一样,规定着该民族发展的基本轨迹。在一个民族文化

的发展过程中,越是原初的越受自然环境的左右。随着人类智慧的不断积累以及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为因素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也就愈强。当各民族文化网越是扩展,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越是加强,不同质文化间的影响也就一步步地加深,各民族间物质的及精神的体系就会从分歧一步步走向融合。

东亚国际秩序的文化源头是西周宗法人伦制度,它的形成与中国初民所生活的生态环境有关。中华文化发源于内陆,以农业耕作为主,又由于当时处在水患四起的时代,因而为了迎接自然环境的挑战,中国初民必须以团体合作的方式谋求生存,所以氏族共同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之后,氏族共同体之间的合作兼并,逐步演化成家庭式的、高度集权的等级政治管理制度。当这一制度在东亚大陆及其周边扩展时,家族管理制度便与五服制相结合,最后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的、礼治的、同心圆结构的东亚国际秩序,而支撑这个秩序的是宗法人伦文化。

古希腊人所创造的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因而,西欧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也沿袭了古希腊爱琴海世界的城邦秩序。由于爱琴海世界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有其特色:星罗棋布的岛屿、被群山隔离的大陆,使得地形破碎;不足的资源、贫瘠的土地不利于农业,于是古希腊人将目光投向外界,以物品交换、海上贸易谋求生存,所以商业发达。在这样的背景中,不易产生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所以古希腊人在个体平等的基础上组成较小的城邦政治体,城邦与城邦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和自助的,因而城邦秩序的结构是无政府的。而各团体乃至个人间的商业关系发达,使得契约显得十分重要,“为古希腊哲学家所倾心向往的,则是一种社会的法则”。^① 17世纪中叶,当西欧国际秩序最终确定下来时,它的结构具有古希腊城邦秩序的特征。该秩序是无政府的、不稳定的、协约式的,主权概念、国际法及势力均衡是其三大基石。^②

① 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5页。

② 转引于斋腾孝:“西欧国际体系的形成”,山本吉宣(编),《国际政治理论》(王志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第14页。

二

文化影响人的各种社会行为方式这一提法并不新异,相反,人类历史中从来就存在着这种现象。就当代来说,马克斯·韦伯研究了新教伦理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认为新教不主张禁欲,促使了资本的积累及人对财富的追求;汤因比研究了文明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人类文明的消长史,并且描述和预测了几大文明的发展趋向,他认为20世纪是西方文明在全球蔓延的一百年,一千年后,西方文明将消融在世界其他文明之中,再过一千年,地球上会出现一种适应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统一文明;白鲁恂(Lucian Pye)提出民族文化与民族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劳伦斯·哈里森(Lawrence Harrison)研究了文化价值与经济和政治的成功之间的关系,并解释了拉丁美洲动荡不安和台湾及韩国的经济奇迹发生的原因;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认为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民具有特定的方式和能力参与和解决经济、政治及社会问题;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一个民族的富裕及竞争能力是受其文化性格及其社会可信度制约的。^① 这些研究都表明文化既影响一个个体的人、一个民族的行为、一个国家的决策,同时也是构成各民族、各社会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结构的主要因素。

研究文化与人类行为关系的成果不少,这里只列举几例,但是,在国际关系领域里研究文化对国家行为及国际关系的影响则是新鲜事。自人类开始研究国家间关系以来,文化的因素一直被忽视,研究的焦点总是放在国家为了权力及财富而争斗的互动关系上。从修昔底德到摩根索、华尔兹、基欧汉等,都在研究权力及

^① 请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汤因比:《历史研究》;Lucian Pye: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Jersey, 1965; Lawrence E. Harrison, *Who Prospers? How Cultural Values Shap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uccess*, Basic Books, 1992; Thomas Sowell, *Race and Culture: A World View*, Basic Books, 1994;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The Free Press, 1995.

财富如何影响一个国家及整个国际社会的行为和结构。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奋斗的目的就是争强权,国家的决策是以国家利益为基本准绳,而国家利益仍然是对权力的获得。新现实主义者虽对现实主义的强权政治有所修正,认为争权力是手段,谋求安全是目的,但同时仍然强调实现和平的手段是获得权力。自由主义(包括新自由主义)一向对维持和平、遏制战争持乐观态度,但他们为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所开的良方是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依然没有将文化因素考虑进去。其实不同质的文化对不同的民族国家的行为有不同的影响,因而它对该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行为目的及方式也有着不同的影响。国家间缺乏相互理解与认同,冲突及猜疑当然不可避免。再者,在西欧社会里人们强调个体自由,认为在平等的基础上以法律手段约束社会行为者以及国际体系的行为者;而在东亚社会里,人们习惯于在等级的社会结构及等级的国际秩序中求得安定,习惯在群体中找到适应于自己的位置,即“名分”。在东亚社会里,如果不乱了“名分”,结构将是稳定的,反之亦然。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文化的“基因”作用。西欧人的政治传统及中国人的政治传统的底蕴来自各自的文化内核,因此研究中、西政治,就必须研究中、西文化。不同的文化促使不同政治体形成其独特的内部及外部特性,同时也促使不同风格的政府及领导群体的产生。当西方人将古希腊、罗马理性从迷信和宗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后,以科学与技术为表象的理性变成了西方社会革新的动力,推动西方社会飞速发展并一跃领世界风骚,西方与世界其他的地方的发展差距也同时被拉大。

近年来,西方许多学者也将文化因素纳入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如阿达·波兹曼(Adda Bozeman),她研究的主题是文化如何影响一国的决策行为以及文化在国际关系史中的作用;亨廷顿认为文化将成为国际冲突及国际关系的主要变量;维克多·伯克(Victor L. Burke)将文明冲突定位为欧洲战争及欧洲社会中国

家形成的基础,即文明冲突导致欧洲战争出现及国家的形成。^① 他们都强调文化在国际政治及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并且认为文化是国际关系变化的主变量及动力。

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试图从文化这一视角分析国际关系的历史,展望国际关系的未来,并从历史事实的分析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化是影响国家行为,乃至国际社会性质、结构及互动方式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阐述文化在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因为政治及经济秩序是人类文化网结构的外层,是文化网内核的延展,所以有什么样的文化内核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外壳。在该章里,对文化及东亚、西欧国际秩序进行了概说,认为文化就是从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中衍生出来的、体现一个民族精神的、由历史传承下来的、人类群体为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东亚国际秩序是产生于秦、汉,消亡于清末的、以中国为中心、以周边其他国家为外围的等级同心圆结构的东亚世界秩序。西欧国际秩序指确立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并于20世纪几乎蔓延全球的多国分立的、无政府结构的国际秩序。

第二章主要阐述文化在东亚、西欧国际秩序生成、发展、兴盛及衰亡过程中的作用,其中以“宗法人伦制”、“五服图式”及其相对立的、沃伦斯坦的“中心—边缘”学说为分析框架,剖析东亚国际社会的历史变迁及其文化渊源。在论及西欧国际秩序生成及发展过程时,

^① 请参见 Adda B. Bozeman, *Politics and Culture: International Histor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and “Culture Clash and Liberal Democracy: Toward A New World Order” *Current*, November, 1994;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No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hat?”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3,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Georges Borchardt, Inc., 1996; Victor Lee Burke,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ar-Making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urope*, Polity Press, 1997.

主要以汤因比文明发展史为主线,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解析了政治秩序的演变是以文化的演进为基础的。

第三章主要以华尔兹的体系结构理论为分析方法,阐明东亚、西欧国际秩序之间存在着体系结构的差异和行为范式的不同。同时提出东亚、西欧国际秩序的源头分别是西周分封制和古希腊城邦制。尽管这两个秩序形成的时间分别都远远迟于分封制及城邦制时代,然而后来形成的秩序却无法摆脱各自原初文化的影响。当然,普遍性总会包含特殊性,如春秋战国是大一统秩序的变异,罗马帝国是多国竞立秩序的变异,他们都是两种文化中特殊的政治表象。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当然也是人类创造文化的前提。当人作用于不同的自然环境时,就创造出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人生态度,同时也就铸造出与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人生态度相适应的文化模式;有什么样的文化模式,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及行为结果。如大陆农业文化所强调的“天人合一”、“大同”、“小康”及“礼治”,都是东亚国际秩序的靈魂;海洋商业文化所崇尚的“天人相分”、“多元分立”、“个体本位”及“法治”则是西欧国际秩序的基石。对自然环境与文化生发及两个文化网的内核的比较分析是第四章第一节的主要任务,主要探讨两个文化网内核的不同特质是两种国际秩序差异的根源。

国际秩序的主要行为者是国家,国和家的基本单位是人。人的行为模式各异导致家的行为模式不同,又导致国家行为模式有差别,最终形成了一个与其他国际秩序行为模式不同的国际秩序。在第四章第二节里,我们主要采用华尔兹的“人、国家与国际社会”这三个层面(three images)^①为基本方法,进一步比较分析中西两国文化网内核之间的差异,目的在于更深一层地显现东亚、西欧国际秩序的差异的根源。中国文化中人是人伦的人,西方文化中人是自然的人,所

^①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以,不论将人放在自然界中、社会中还是政治中,中国人是一种链式关系中的一个环节,比如是天地之产儿、君臣父子及一个王朝的臣民等,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定位;西方文化中人像原子一样是分立的,在城邦或民族国家中起着公民的作用。中国是家国同构,因而东亚社会一直生存在一个大家庭的蔽影下。朝贡秩序的一大特征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贸易逆差,中国只享受这种类似父母或长兄的那种天下大宗的荣誉,跟欧洲的那种勒索式、剥削性的取贡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国是国,家是家,就像独立的人是组成国家的原子一样,国家是组成国际秩序的原子。中国乃至东亚社会的维系纽带是人伦,而西欧社会的维系纽带则是社会法则。

第五章着重探讨了全球化中的东亚和中国。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很难用先前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框架来准确描述当前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然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全球化将是一个充满兴奋、和平与向往的过程,它同时能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更深层次的沮丧、争执及更激烈的竞争,甚至于冲突,最起码全球化是一个和平与冲突并存的过程。当东亚受到外部冲击后,其内部“基因”发生了裂变,释放出的能量是巨大的。东亚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走完了工业化的道路,英国实现这一目标却花了 200 多年。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坚持反对单边主义,坚持国际社会民主化,但不扛旗;参与全球竞争,但不对抗。中华民族本有“和”与“中”的优良传统,应站在“两端”的“中值”处,无为而无不为。

当人类进入 20 世纪末时,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政治区域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人类几大文化网已在外围层面上开始交融,文化网外层的交融必然波及到内核的交融。另外,随着科技的飞跃式发展,人类已一步步地克服了地域空间的障碍,地球一天天地变小,人类将会生活在“地球村”里,那么,人类的文化将更一步步地趋同。这是最后一章所论述的内容,同时我们还认为,越是原初的,文化因素影响越大。由于科技的发展,人的能力大大提高,越是远离原初的,人为因素的作用则越大,人为因素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和改变原初的文化内核,也就是说,文化网外层反过来越来越多地作用于文化网内核,

致使内核与内核的融合。今天,东亚、西欧国际秩序已融入现代世界秩序之中,但几大文化网核心依然存在,只有核心的多元整合,才能实现实际意义上的一体化和真正意义上的殊途同归。

第一章 文化与国际秩序

第一节 文化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价值更新和精神释放的产物。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演化,实质上是文化的进化;文化的进化,取决于文化的选择;文化的选择,是以社会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科技工具、伦理道德、伦理思想的整合力量为依据。”^①总体上讲,人类拥有一个文明,就是对自然的征服及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改造,也就是劳动及对劳动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就是人在不断认识自己、解放自己的一个进程,而征服自然、解放自己的过程也就是创造文明的过程。“人类都是试图超越起码的人性——即超越原始人性——以达到某种更高尚的精神生活”。^②然而,就像一个家庭中有不同“性格”的成员一样,人类社会也分享有不同“性格”的文化,而且有些“性格”差异十分显著。在文明的进程中,虽说有诸多原则是不同民族共同遵守的,但不同区域的文明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展开。

一个个体人的遗传性格和其在后天环境中形成的性格,对其一生的发展及生活的态度具有很强的制约力,甚至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理,一个民族的文化对该民族的存亡及发展也起着巨大的作用,它就像一个民族的“基因”一样决定这一民族的发展轨迹。一言以蔽之,不同质的文化对不同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的生发有着不同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从人类群居开始,贯穿在所有文明的发展进程

① 张立文:《和合与东亚意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②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7页。

中。在新石器时期(人类生产食物的阶段),人类从小群体发展到较大的群体(政治团体),劳动及分配等活动逐步组织化。然而,“人类所面临的是不太有利的生态环境,于是让我们创造另一种环境,人为的因素超过了自然的因素。而由人类摆进去的因素其影响力比天然的影响力更大,日子愈过愈复杂,人为的因素对我们的影响也愈大。于是文化的传承性和由传承而产生的分歧性也愈大,而每个文化特质的出现以及走向某个已定方向的速度和距离也随之加强,直到另一个阶段,人类必须再一次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又回头由分歧走到融合交流”。^①而到了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历史将各种轴心文化推向了碰撞交融期,文化全球化初显端倪。在人生态度及生活方式全球化过程中,最先扮演主要角色的是在宗教与世俗社会以及宗教内部冲突的夹缝中诞生的民族国家,随之便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殖民扩张与传统文明自我生存之间的冲突。可以说,殖民与反殖民之间的紧张以及民族生存与发展是20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的主因。当殖民秩序解体后,人类便在意识形态集团之间对抗。冷战结束后,冲突的主线转向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与碰撞。到头来,科技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开始步入地球村,将来的地球村又为文化交融提供了客观的物质条件。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程度,可是,生产力岂能离开人而自行发展,人才是世界的主体,是生产力系统中首要的能动因素。人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从事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生产,而一定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归结为一定的文化关系,所以,文化也就成了生产力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程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生产力的落后总是与文化的落后分不开的,反之亦然。生产力运行的过程不仅是物质创造的过程,而且是文化创造的过程。人要利用自然,就必须观察认识自然,所以,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人类意识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生

① 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页。

产力的结果,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归根结底是人,人是文化生发的原动力,人的能动性导致社会结构的不同,反过来,不同的结构又限制了人的活动。换句话说,人是文化的动物,是文化的创造者,也为文化所创造。人在改造自然、谋求生存的过程中,由于地理环境、气候等因素的不同,生发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又生发出不同的民族特性及其文化精神,这样,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就形成了,而不同的文化模式又决定了不同社会的轨迹及其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比如原本生产力发展程度相对很高的古代中国,却未能像西欧社会那样主导现代工业文明,很大程度上缘于不崇尚竞争的早熟文化传统扼杀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人文因素。再者,何以产生西欧和东亚不同的国际秩序呢?因为西欧与东亚社会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文化传统导致东西民族不同的行为模式,因而造就出不同发展轨迹的国际秩序。

特定的政治形态是建立在特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上的。古代中国的政治统一是建立在大一统的生活方式及社会结构之上,西欧分立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西欧人以个体独立为主的生活方式之上。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不同的)政治体系的基础就是不同质的文化,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国家间关系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①因为人的政治社会是人客观和主观地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是自然中有意识活动的结果,所以,人类社会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社会,人存在于社会也就是存在于文化中。“人类社会的演化,实质上是文化的进化;文化的进化,取决于文化的选择;文化的选择,是以社会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科技工具、伦理道德、价值思想的整合力量为依据。人类社会从畜牧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的选择,从总体上说不能不讲是文化上的差异。它包括器物的、制度的、价值的、精神的等等,是一种和合的驱力”。^② 而一个社会中的各种制度实际上是文化的一部分。“任何社会制度亦都

① Adda B. Bozeman, *Politics and Culture: International Histor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p. 5.

② 张立文:《和合与东亚意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26页。

是建筑在一套物质的基础上,包括环境的一部分及种种文化的设备。用来称呼这种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最适合的名词莫若‘社会制度’。在这定义下的社会制度,是构成文化的真正组合成分”。^①

人的生存环境无外乎两点,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化则是这两者的综合。亦即影响一个民族文化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自然生态环境,二是人文环境。人类在原初时,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力大,因而各民族原初文化深受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制约,可以说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当文化网基本形成后,人文环境对人发展的作用就超越了自然环境对人发展的制约。正如塞内加尔前总统桑戈尔所说,“文化不仅是社会的核心,而且是社会的细胞、躯壳和纽带,甚至是社会存在的理由”。因为,“如果人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文化不仅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始与终,而且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内涵和外延,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始与终”。东亚国际秩序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西欧的国际秩序则建立在古希腊罗马及基督教文化之上,而不同质的文化又决定着不同国际秩序的生成与发展。中国的初民生活于广袤的平原地区且有黄河众多支流供给充分的水源,十分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于是在中原地带生发出“天人感应”、崇尚礼仪、谋求安稳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在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中衍生出蔓延于东亚地区的内向型的农业文化,这一文化的基础就是周孔儒家思想。儒家的伦理基础是“仁”,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仁治,德治。儒家文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推崇普世仁爱,于是,中华民族与其周边各民族一同建立起以礼仪为主的“天朝礼治秩序”。^② 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古希腊文明。古希腊社会分散于多山的巴尔干半岛南端,诸多的爱琴海岛屿上以及小亚细亚西南部,不宜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由于地形分散且狭小,所以内不足,只好向外求发展,这使得古希腊各社会间的贸易交往发达,于是就产生了外向型海洋商业文化。这种文化规定了西方社会发展的轨迹,

① 马凌诺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0页。

② 黄枝连:《天朝理治体系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